

守望敦煌



游客在敦煌印局参观游览。

敦煌重生：从莫高悲歌到复兴之路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图/新华社】



游客在参观敦煌文博会上的展览。

一个道士的罪与罚

清雍正元年(公元1723年),清廷于敦煌置沙州所,两年后升为沙州卫,并从甘肃56州县移民2400多户到沙州屯垦。乾隆年间,沙州卫升为敦煌县。清廷对敦煌的营建,与其强化对西部地区的统治是相关的,旨在将敦煌打造成通过控扼河西走廊,统摄西域的军事重镇。

说来讽刺,改变这一切的,是一个叫王圆箎的道士。王圆箎,湖北麻城人,当过兵,后出家当道士,云游四方。大约在光绪二十三年(公元1897年),王圆箎落脚敦煌,招揽信徒、接受布施。按照后世的叙述,王圆箎偶然发现了藏经洞,为利益所驱使,廉价卖给寻迹而来的外国冒险家。

1900年6月22日,雇工杨某在清理某个石窟的甬道时察觉到墙壁上有裂缝,朝里望去,似乎隐藏着些东

西。王圆箎闻讯后开挖墙壁,露出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洞窟,借助微弱的烛光,他看到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经卷、写本、拓片、绢画等文物。他不断从藏经洞取出文献,拿给熟人、朋友看,颇有些待价而沽的意思。如愿意收购,他就出售。这样,藏经洞文献在民间流传,渐渐被一些高官、学者接触到。可惜欣赏之余,竟无人想到前往敦煌,一探究竟。

王圆箎最终迎来了一个外国“金主”——英国考古学家、冒险家斯坦因。

1906年8月,斯坦因深入我国西部地区,盗挖了大量文物。1907年3月,斯坦因一行抵达敦煌。彼时他并不知道藏经洞,仅仅是路过,顺便考察一番。打听到藏经洞的信息后,斯坦因两眼放光,立刻意识到遇到了宝贝。经过讨价还价,他以130英镑的价格,从王圆箎手中购入24箱古代经卷文书,5箱绘画、刺绣及其他工艺品。

交易过程中王圆箎耍了心机。他有意留下书法水平高、保存较好的文献,尽量把那些残破的,或者用汉语以外文字书写的文献交给斯坦因。谁知弄巧成拙,斯坦因由此得到许多梵文、于阗文、回鹘文文献,学术价值极高。

一段刻骨铭心的屈辱史

斯坦因之后,法国人伯希和、俄国人鄂登堡、日本人大谷光瑞等,盗走了包括藏经洞在内的大批敦煌文物,给这座千年古城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。

此时清廷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电令甘肃方面把敦煌所余经卷押送到北京保存。结果一路上官吏不断窃取,送至京师图书馆时,只剩下8000多件断编残简了。这决定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,一开始就落后于人。这才有了这样的屈辱性说法——敦煌在中国,但敦煌学在海外。

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!”这是史家陈寅恪发出的喟叹。彼时,敦煌文献中的精品大多流落于伦敦、巴黎、莫斯科等地,中国学者要研究,只能自己去。于是张元济去了,刘半农去了,胡适去了,郑振铎去了……一代中国的文化精英,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,纷纷出海“朝圣”。

其中郑振铎的经历和感受颇具代表性。他于1927年5月先到巴黎,首站法国国家图书馆,借出的第一本书是被伯希和盗走的敦煌抄本《太子五更转》。接到抄本的那一刻,他激动得双手颤抖。此后郑振铎前往伦敦不列颠博物馆,查阅被斯坦因买走的敦煌文献。不列颠博物馆有一条规定:善本只准看,不准抄录。郑振铎只好先背一段,再到外面记下来。可这太累了。正在伦敦的老舍、朱光潜等人闻讯赶来,帮他轮流背诵、默写。

这段经历让郑振铎刻骨铭心,后来他说过一番沉痛的话:“史在他邦,文归海外,奇耻大辱,百世莫涂!”

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同样在1927年,来自杭州的常书鸿赴巴黎学油画。家境优渥的他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,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在旧书摊上找到一本伯希和编纂的《敦煌石窟图录》,大感震动。在爱国热情的召唤下,常书鸿毅然回国,立志让敦煌学在祖国扎根,荡涤耻辱。1942年,中国政府决定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,常书鸿积极响应,并亲赴敦煌。当他历经艰辛来到莫高窟时,立刻被这浩瀚璀璨的艺术天地吸引,开始如饥似渴地临摹、研究。从此,常书鸿的人生轨迹就和敦煌的重生与复兴重合起来。

1944年,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,常书鸿担任所长。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,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,任凭损毁、破坏、偷盗的历史。而真正将敦煌学发扬光大,还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。

一代代敦煌人的“莫高精神”

1949年,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,后将其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,常书鸿任所长,确立了“保护、研究、弘扬”的办所方针。同时,通过组织分配、调动等方式,吸引了包括樊锦诗、孙纪元、关友惠、杨同乐、万康育等一批年轻人,为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,也使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更为系统、科学和专业。

1963年至1966年,国务院拨款99万元用于莫高窟大规模加固工程,共加固石窟195座,岩壁

363米,挡墙砌体及梁柱7000余平方米。此举解决了石窟所面临的风沙雨雪和日照危害问题,莫高窟保护迎来了根本性的好转。

但毋庸讳言,条件仍然是极其艰苦的。历史照片显示,敦煌莫高窟到处是断壁残垣,哪怕经过加固工程,工作人员仍免不了经受风吹沙打、日晒雨淋。一代代敦煌人就这样与大漠戈壁相伴,忍受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痛苦,以坚忍的毅力和卓绝的努力,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默默守护着国宝。

说“默默”一点也不夸张。百岁高龄的孙儒僦主持设计并实施了莫高窟多期石窟加固工程,还参与过榆林窟、西千佛洞等石窟的保护修复工作。在《我所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》一文中孙儒僦写道:“即便是已开裂或即将倒塌的塑像、空鼓起甲的壁画,也是或修缮扶正,或修复加固,都是修旧如旧,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。”

然而以孙儒僦为代表的“打不走的敦煌人”,在乎的从来不是个人印痕,而是守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他们一代接一代奋斗,与风沙对抗,和时间赛跑,用“坚守大漠、甘于奉献、勇于担当、开拓进取”的“莫高精神”,辛勤耕耘于大漠之上,不断探索、持续创新,誓将敦煌学发扬光大。

迈入新时代,为让敦煌壁画、彩塑信息永久保存、永续利用,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文博界进行文物数字化探索,形成一套科学的壁画彩塑数字化技术,制定了十几项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标准与规范,“数字敦煌”建设成果喜人。与此同时,随着方法、技术、手段升级完善,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、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,在保护、研究、弘扬方面均处于全国乃至国际领先地位。

1957年5月,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造访敦煌,他赏壁画、观塑像,不断地发出惊叹,完全沉醉在敦煌艺术中。更令他欣慰的是,通过敦煌人的不懈努力,“史在他邦,文归海外”的屈辱局面终于得到扭转。临走前,郑振铎欣然题词:“千年之美,毕集于斯,诚可谓为民族艺术的大宝库也。”



敦煌文博会展现代彩丝路文化。

QA 生活周刊×张涌泉

张涌泉,敦煌学专家,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近年来带领团队致力于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,并取得重要成果。

敦煌是文明互鉴的历史参照

生活周刊:敦煌文献一直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,请您介绍一下它的价值和意义。

张涌泉:首先是跨度长,纵贯600多年。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大批写本文献,最早的是东晋的《法句经》,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,历经十余朝。这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档案序列,为早期中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时间标尺。其次是内容多元。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,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,也是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之地。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,奠定了敦煌文献多元性、丰富性的基础。此外,敦煌文献涵盖名籍、户籍、田籍等籍账文书,买卖、佃租、借贷等契约文书,以及律、令、格等法令文书,它们大多出自下层官吏、僧侣和庶民之手,文字质朴,内容真实反映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实态,构成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古代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。

生活周刊:近代以来,大量敦煌文献流落海外,那么它们的散布情况是怎么样的?

张涌泉:据初步统计,现存的敦煌文献共有7万余号,分散收藏在全球数百家机构和个人手中。其中英国17000余号,法国7000余号,俄罗斯19000余号,日本大约有1500号,国内收藏25000余号。敦煌文献的数量虽然多,但很多是断编残简,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。

生活周刊:请介绍一下工作情况和取得的研究成果。

张涌泉:“缀合”是指通过比对残片文字、笔迹等特征,把分散的文献碎片重新拼接复原。我和我的团队是在2007年左右开展这一工作的,经过18年努力,缀合残卷数超过17500号,其中佛经类文献的可缀合比例达27.8%,超过四分之一。今年4月,我们已经将部分成果集结出版为《拼接丝路文明——敦煌残卷缀合研究》一书。通过研究,我们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了全新的观点:莫高窟藏经洞实为存放修复材料“古坏经文”之所,也就是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“故经处”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残卷。同时,我们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研究方法,提出残卷缀合的基本流程与12项具体准则,包括内容相邻、字体相同、书风近似等关键要素,从而构建了一套可操作、可推广的方法体系,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。

生活周刊:您如何看待敦煌文献研究在当下的意义?

张涌泉:敦煌文献的研究史,也是一部中外学术交流史。更重要的是,敦煌承载的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,为当前的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参照。目前,我们努力构建敦煌残卷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,用统一标准推动各国所藏敦煌文献资源无障碍流通,真正践行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世界”理念。相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协作的深化,敦煌文献将继续扮演“文明使者”的角色,让丝路两端的人在回望历史中,更好地进行交流与对话。